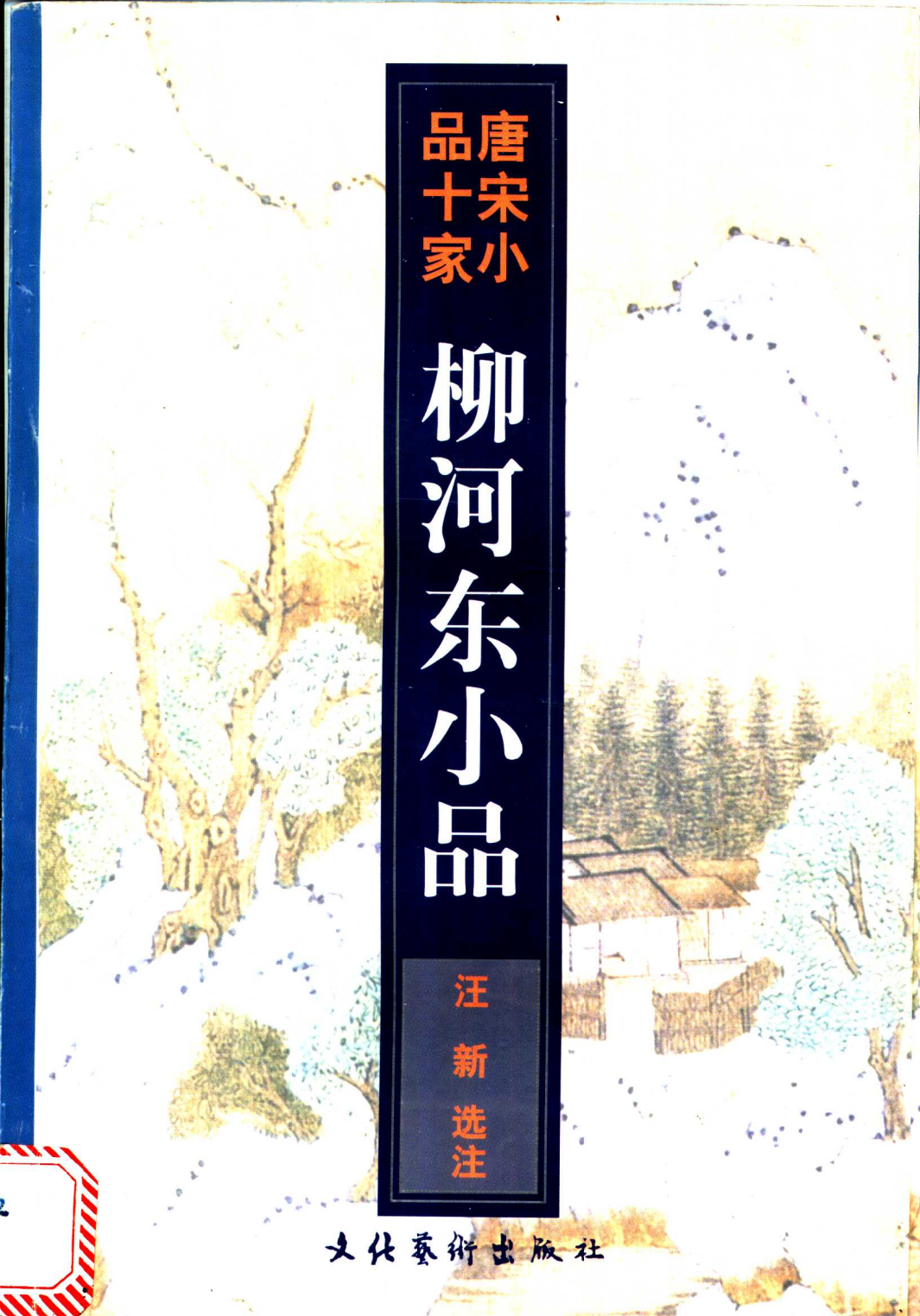




唐宋小品  
十家

# 柳河东小品

汪  
新  
选  
注

文化艺术出版社

# 柳 河 东 小 品

汪 新选注

文化艺术出版社

## 柳河东小品

汪 新选注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博诚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8.25 字数：142,000

1997年1月北京第1版 199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ISBN 7-5039-1535-8/I·678

定价：12.60元

## 出 版 说 明

因为我社《明人小品十家》的编辑出版，获得了不少好评，于是，就有了续编《唐宋小品十家》的想法和今天的这套丛书。

小品作为散文一脉，虽滥觞甚远，然而却实在没有严格的界定与模式。只是明清之际的文人抒写性灵，做出许多任情率意的轻灵文字之后，人们便习惯于把小品文与轻松闲适联系在一起。本世纪三十年代，林语堂等人的提倡与推广，遂使小品文定位于悠闲与轻灵之间。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左翼作家，对此非常愤慨，并明确指出：“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入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

然而，文学理论上的界定，并不一定能成为社会的共识。近年来，图书市场上小品文大行其道，人们对小品文的理解，似乎仍脱不了“性灵闲适”的范围。我们在编辑《明人小品十家》时，也还是本着轻松明快的旨趣。

唐宋两代的小品，却无明清那般风格齐整，更不用说轻灵秀美了。唐人文尚辞赋，四六文作得颇为精彩。虽然有韩愈、柳宗元力倡古文，但他们抒发真性的方式是诗。宋人比较清通，尤其是他们的语录，写得格外洒脱平易，意味隽永；可他们更喜欢在词令中倾诉自己的感情。因此，唐宋之际，虽有八位散文家比肩而出，但他们的文章更多的是凝重、庄穆，甚至有些沉重。如果仍拿着“性灵闲适”的尺子来编纂唐宋小品，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好在小品文并不等于性灵通脱，借用鲁迅的话说：“讲些小

## 2 柳河东小品

---

道理，或没道理，而又不是长篇的，才可谓之小品。”按照这样的思路，参考作家的声望和代表性，我们为《唐宋小品十家》选择的作家是韩愈（昌黎）、柳宗元（河东）、罗隐（昭谏）、皮日休（鹿门）、陆龟蒙（甫里）、欧阳修、王安石（介甫）、苏轼（东坡）、陆游（放翁）、刘克庄（后村）。书的命名，则根据其本人较为常见的字号而定。

既然是小品，简洁似乎是必需的条件。所以，涉及到每个作家的作品选取时，我们也要求尽量不选那些宏篇巨制或“板着面孔”说理的文章，即使是公认的名篇，也不妨割爱；而诸如柳宗元的游记、欧阳修的书简、苏轼的题跋，虽然不足以反映他们文学成就的主要方面，但却因为不曾带有太多的“载道”重任，而自然流露出作者较为真实的内心层面。类似的篇什，是我们希望能奉献给读者的。

尽管如此，唐宋之际的小品文，与明人还是有明显的差别。韩、柳、欧、王姑且不论，即使被鲁迅大力推崇的罗、皮、陆的作品，其中的不平、愤懑、沮丧甚至绝望，也是在明人小品中很难体会到的。这也许正是小品文特征的另一层面的展示。读读它们，人们应该别有一番滋味。

从明人小品到唐宋小品，选题的确定更多地是从市场去考虑的。然而，如果以此为契机，对历代的小品文作一番重新的检索与梳理，也不失为一件有意义的事。当然，任何想法都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

文化艺术出版社

## 前 言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县），幼居长安。唐德宗贞元九年（793）进士及第。贞元十四年（798）入仕，相继为集贤殿正字、蓝田尉。

柳宗元是唐代一位散文大家，文体文风的改革者，与韩愈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但他首先是一位具有改革意识的学者和热烈而执著的文人政治家。大约登第后不久，他即与同榜及第的刘禹锡一起结识了太子身边的王叔文。王叔文出身寒微，有刷新朝政的抱负。贞元初以善棋入侍东宫，依靠太子李诵，结纳人才，颇有远图。他对刘禹锡、柳宗元都很器重。贞元十九年（803），柳宗元擢为监察御史里行，刘禹锡为监察御史。御史官阶虽不高，却是可以活动于上层、容易接近皇帝的重要职位。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德宗去世，经过一番斗争，顺宗（太子李诵）即位，王叔文、王伾等秉政，在短短的四、五个月中，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柳宗元于德宗去世后即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刘禹锡为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在改革活动中，参与谋议，草拟文诰，采听外事，是王叔文集团中十分活跃的骨干，以至当时有“二五刘柳”之称。

王叔文集团的改革锋芒主要是指向宦官、强藩的，自然遭到他们的反对。其年五月，以范希朝、韩泰为京西北诸镇行营兵马使，谋夺宦官兵权，此事使宦官认识到扑灭改革势力的紧迫性。

顺宗即位时已患重病，其长子李纯是反对王叔文集团的。王叔文等预谋另立嗣君。可是，在宦官的策动下，李纯终于依照“立嫡以长”的原则被立为太子。此后，宦官又联合方镇，对朝廷施加压力，荆南、剑南西川、河东三大镇的节度使交章论奏，逼迫顺宗退位。八月，顺宗终于被迫内禅，李纯即位，即宪宗。刘禹锡晚年曾用东汉末宦官拥立桓帝、顺帝的典故追叙这次事变：“宫掖事秘，而建桓立顺，功归贵臣。”（《子刘子自传》）这几乎是明言宪宗之立决定于宦官。

宪宗即位后第一件大事，就是严厉打击改革派的代表人物。尚未举行登基大典，便把王叔文贬为渝州司户，次年赐死；王伾贬开州司马。九月，贬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为远州刺史，十一月又加贬为远州司马，史称“八司马事件”。柳宗元先贬邵州刺史，赴贬所途中追贬永州（今湖南永州市）司马。元和元年（806）八月，宪宗又明令“八司马”不得享受大赦，“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旧唐书·宪宗纪》）。

柳宗元学识渊博，注重实践且有变革意识。他以儒道自任，声称自己的言行指归，不出尧、舜、孔子的“圣人之道”。又把圣人之道称为“中道”、“大中之道”。他所说的中道，是“施之事实”、“辅时及物之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并不是趋向保守的理论。“圣人所贵乎中者，能时其时也”（《与杨晦之第二书》），认为理论必须具有适应时代要求的实践品格。这同他“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容书》）的参与之志是联系在一起的。唯其如此，他主张通权达变，“经非权则泥，权非经则悖”（《断刑论》下）。因此，他虽尊崇儒学，却不迷信儒学；他的学风具有鲜明的怀疑、批判的特点。他主张读书明道要有“立”有“革”。“必先究穷其书，究穷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先穷昔人书，有不可者而后革之，则大善”。（《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书》）这样，他对儒学便有所取舍和改造。

在《六逆论》中，他对《左传》的六逆说持不同看法，认为“六逆”中的“贱妨贵”、“远间亲”、“新旧旧”都是择君置臣之道，“天下理乱之大本”，不得称为“逆”。如果贵、亲、旧者愚，而贱、远、新者贤，那么后者对于前者是完全可以“间”，可以“妨”的。他主张选择嗣皇不以嫡出为据，任用重臣不以亲疏、新旧为标准。这是一个反传统的观点，实际上是改造了儒家择君置臣之道。韩愈《永贞行》中的“元臣故老不敢语”、“数君非亲岂其朋”等语，便是以贵贱、亲疏、新旧之分的观念去攻击革新派的。试以韩、柳相比，更见柳宗元思想之锐进。柳宗元的理论著述虽然多撰于永贞革新失败以后，但这些文章表述的变革意识却无疑既已存在于此前，成为革新派政治活动的思想依据，如此锐进的思想，必然会在实践中引起强烈的抵制。王叔文等秉政时，李纯的太子地位曾经发生动摇，依照柳宗元的理论，即使把李纯废掉，另立嗣皇，也是合乎圣人之道。所以，宪宗与王叔文集团积怨很深，即位以后当然要不遗余力地予革新派以狠命的打击。王叔文等人出身卑微，官职不高，多数正当壮年，依照习惯的看法，正是所谓贱者、疏者、新者，他们骤然秉政，锋芒毕露，依照柳宗元的理论，是完全正常的。然而正因为这样，他们不仅要遭到宪宗与宦官的迫害，也必然要招致习惯势力的反对和抵制。所以，王叔文等遭到打击时，朝中竟无人援之以手，除去积极参与打击者，便是漠然的沉默。

柳宗元被远谪边荒，十年不见迁转，直到元和十年，才与刘禹锡等奉诏回京。然而，抵京以后，又都被出为远州刺史。柳宗元得柳州（今广西柳州市），五年之后，卒于贬所。从三十三岁到他死去的十四年中，柳宗元都是以罪人的身份在流放中度过的。在这十四年中，他在罪谤交集的重压之下，虽然痛苦不堪，却仍然执著自我，除继续阐发他的理论主张，研讨学术外，还深入研究佛学，很有成就。

“柳子厚南迁，始究佛法”（苏轼《书柳子厚大鉴禅师碑后》），柳宗元深入钻研佛学，是在被贬到永州以后。他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说。于零陵，吾独有得焉。”（《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他研究佛教的经论，深得佛学的精华，他赞赏天台宗“三谛圆融”的“中道”学说，吸取其虚实相即、有无统一的思维方法，援佛入儒，形成了一些统合儒释的观点。他对佛教中的宗教迷信成份与精致的哲学思想加以区别，称前者为佛之“迹”，予以反对，后者为佛之“言”，认为是释教之“韞玉”，有可吸取的精华。韩愈曾责备他“嗜浮图言”，“不斥浮图”。他则批评韩愈反佛的根据只是“以其夷也”，“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送僧浩初序》），所以不是“去名求实”的态度，从理论上揭示了韩愈反佛主张的弱点。

在后半生的贬谪生涯中，柳宗元既致力于理论著述，也致力于文学创作。在文学上，他与韩愈齐名，主张“文以明道”，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又一倡导者。他与韩愈论文的不同之处在于没有韩愈的儒家道统观念，只是强调文须有益于世。他对于文学创作与政论或学术著述亦有所区分。他在《杨评事文集后序》中，提出了一个与诗文写作都有密切关系的观点。他说：“词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对于政论文章与文学创作做了区分。他认为“著述者流，……其要在于高广壮厚，词正而理备”；“比兴者流，……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流于谣诵也”。对于“比兴者流”的认识，接近于现代的审美形象等说。

他的散文除说理文章外，尚有审美趣味十足的山水游记、寓言、传奇、抒情文与杂文等。这些作品多写于贬谪生活中，内容很丰富，可视为唐代文体、文风改革的最高成就。本书从中选取篇幅较短者86篇，名为小品。这些小品可称道者主要有抒情小

品、山水游记、寓言小品和学术小品。

柳宗元的抒情小品常常假设人物，虚构故事，或抒发内心的抑郁悲愤，或抨击黑暗的社会现实，大多含意深远，言辞犀利。

柳宗元早年“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他有强烈的用世之心，也有杰出的政治才能，可是，他虽操术致忠却遭受贬斥，不为世用，他的抑郁悲愤是非常强烈的，一些文章表现了被贬以后的悲愤心情。《对贺者》虚拟友人来永州相唁，见其怡然坦荡，无悲戚之容，遂以为贺。作者因自谓身遭贬斥，惟苟生幸存而已，外虽安闲放任，实怀危惧之心，并说：“嘻笑之怒，甚乎裂眦；长歌之意，过乎恸哭。庸詎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这篇文章正是表达这种怒极嘻笑、哀极长歌的悲愤情怀。另一篇《愚溪对》则更多愤懑不平。作者假托溪神入梦申问“愚”名之由，借溪自喻，谓当今明王之时，智者近用，愚者远伏，智者聪明皎厉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愚者触罪挨辱愚陋黜伏。这些深曲的反语潜藏着牢骚与不平，是对那个是非不分，贤愚颠倒的世道的谴责。柳宗元被贬以后，意识到他在“永贞革新”中，身处危疑之势，而年少气锐，不知几微，一心直遂，因而遭受贬斥。世道诡曲奇邪，直道而行反成颠蹶。《愚溪对》说自己言行不合时宜以致遭遣：“吾茫洋乎无知，冰雪之交，众裘我絺；溽暑之铄，众从之风，而我从之火。吾荡而趋，不知太行之异乎九衢，以败吾车；吾放而游，不知吕梁之异乎安流，以没吾舟。”这些反思和回顾带着极深的愤懑不平之情。

柳宗元还有一些抒情小品抨击社会的丑恶与黑暗。这些文章常常设喻引譬，笔法隐晦而又精警深刻。《骂尸虫文》责骂告密进谗的小人。传说尸虫专伺人之隐微失误，谗于天帝，以求赏赐，人多因此生病夭折。作者深恶尸虫之行，于是为文责骂。文章揭露尸虫阴幽诡侧、潜窥默听的阴险面目和外搜疥疔、下索痿

痔的丑恶姿态，并指出、尸虫“以曲为形，以邪为质，以仁为凶，以僭为吉，以淫谀谄诬为族类，以中正和平为罪疾，以通行直遂为颠蹶，以逆施反斗为安佚，潜下谩上，恒其心术，妒人之能，幸人之失”。作者谴责尸虫这种颠倒是非、淫谀谄诬的恶行恶德，并警告尸虫，如不改悔，将遭雷击。这篇文章表现作者对丑类的憎恶和愤恨，言词激烈，声色俱厉。《宥蝮蛇文》表达了与上篇相同的主题，但感情较为深沉。文章认为，蝮蛇穷凶极恶乃其本性使然，虽欲不为而不可得。虽可恶，亦觉其可悲可怜。痛恨之至反生宽恕之情，感情深沉曲折。“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等即处在罪谤交加之中，无由自解，这些文章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设喻引譬是为了表现现实斗争。《憎王孙文》隐喻当时的政治斗争。其序文说，猿与王孙“德异性，不能相容”。猿仁让孝慈，群居相得。王孙德躁而嚣，群居不相善，群猿欲逐王孙，却反为王孙所逐。这篇文章喻意分明，在这里，猿群喻指王叔文集团。王孙群喻指打击王叔文集团的朝中官僚，猿与王孙之争实指朝廷权力之争。作者对王孙的描述反映了他对政敌的批判和憎恶。

柳宗元的这些抒情小品都是作于被贬以后，因身处逆境，所以设喻引譬，为文隐晦，而强烈的感情难以自己，又使文章言辞犀利，锋芒毕露，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执着、深刻和愤激。

柳宗元散文的最高成就表现在山水游记中。他的山水游记在对自然美的感受中融入抑郁悲愤情怀，创造出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他的山水游记多表现清冷幽美的境界。其中的山水多是一丘一壑、一溪一潭，地处偏僻，环境凄清。《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写了一个清幽的小潭。潭水空明澄澈，潭上树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潭岸曲折深幽，凄清寂寞之境使人难耐。最后写到置身潭上的感受：“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动寒骨，

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所着力表现的正是这种幽邃寂寥、使人凄神寒骨的境界。这种凄清寂寞的情调反映了作者被贬以后抑郁悲愤的情怀，在这些山水游记中，自然山水的描写和主体情感的抒发是融为一体的。一些游记托物寓意，义旨深远。《钴姆潭西小丘记》有一段关于小丘命运的感慨：“噫，以兹丘之胜，致之沅、镐、鄠、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小丘托地遐远，为人所弃，与作者获罪遭遣的命运相同，自然山水的描写实以寄寓被弃被囚的悲愤情怀。

柳宗元出游山水，常使自己沉浸在大自然中，这是一种全身的投入，他在领略自然之美的同时，把自己化入自然，使自己的精神与宇宙天地融为一体。他的山水游记表现了这种物我冥一的境界。《钴姆潭西小丘记》表现作者在小丘上的悠然自得，文中写道：“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日谋，悄悄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小丘之景与丘外之景都呈现在眼前，清泠之状，悄悄之声，目接耳闻，在与自然万物的交接中，主体进入了一个更高的精神境界，在这个境界里，主体意识与天地精神相融合，人完全化入自然，最终获得了心神的虚静。这种物我交融的感受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有更为直接的表述：“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引觴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在这里，作者与自然外物和天地精神相伴相游，其主体意识逐渐消解在自然万物之中，以至与万物冥合为一。

这种化入自然的审美态度源于作者被贬的遭遇和悲苦的心

境。柳宗元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说，自遭遣以后，心怀忧惧，于是“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他的出游是在遭遣待罪中怀着危惧凄凉和愤懑不平的心情从自然山水中寻求慰藉，在自然之美中忘却现实的苦难，从而获得内心的平衡和精神的超脱。

柳宗元山水游记中的山水描写成就突出。这些描写能准确把握山水的特点，做到形神兼备。写丘石：“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嵌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写水流：“水平布其上，流若织文，响若操琴。”写声音：“风摇其巅，韵动崖谷，视之既静，其听始远。”写潭中游鱼：“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他对自然的声形等有深切细腻的感受，在表现时又运用简洁传神的语言，所以在他笔下，这些自然山水形神毕现，生动逼真。

柳宗元的寓言也极富创造性。他的寓言作品有《三戒》、《螾传》、《鹧说》、《黑说》等。

柳宗元的寓言是对社会人生进行深入观察和严肃思考的结果，大多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深刻的哲理。《三戒》包括《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三篇，是其寓言的代表作。《三戒》序言其立意说：“吾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扬以逞，或依势干非其类，出技以逞强，窃时以肆暴，然卒殆于祸。”这三则寓言之意相同，只是说明的侧重点不同。《临江之麋》言临江之麋依仗主人之势，与犬狎处，以至忘己为麋，一旦出门，为外犬所杀食。此即所谓“依势以干非其类”。这则寓言实喻小人得势，则无所忌惮，一旦失势，自取灭亡。《黔之驴》谓驴外强中干，因“出技以逞强”，终为虎所食。无能无德而又惯于卖弄者类此。《永某氏之鼠》写鼠因受主人庇护，“窃时以肆暴”，一旦时移势去，终归灭亡。这三则寓言从三个不同的侧面

说明同一个道理，那就是：“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卒殆于祸”。同样的哲理，也体现在《黑说》中。猎人企图利用动物“狐畏虎，虎畏黑”的特点以猎取野兽，最终被黑吃掉。寓言最后说：“今夫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为黑之食也。”这些寓言多托言动物，实寓深刻的人生哲理。

柳宗元的寓言，有的只叙述故事，哲理蕴含其中，不予表露。更多的寓言是叙述之后，继以议论。这些议论或引出或发挥寓意。《蝮螭传》的重点在于引发议论，这段议论笔锋直指世间追求利禄、贪得无厌的人，讽刺他们虽名为人，智则小虫，其结局亦类小虫。这段议论使寓意更为明确具体，反映了寓言的真正立意。同样，《鹞说》的主要篇幅不是叙述故事，其重点是借鹞的故事阐发仁义之道，并进而针对现实，大加发挥。

柳宗元的寓言反映了他的人生体验，故能深刻精警。这些寓言一般形象生动鲜明，语言简洁犀利，风格冷峻。

柳宗元被贬以后，曾致力于学术研讨。他的学术研究继承了春秋学派啖助、赵匡、陆淳等人的怀疑、批判精神，这主要体现在疑辨群书，特别是诸子书的辨伪上，本集中的《辩列子》、《辩文子》、《论语辩》、《辩鬼谷子》、《辩晏子春秋》、《辩亢仓子》、《辩鹞冠子》等，都是辨伪专论。

这些辨伪著作，所辨范围较为广泛。有的确定书作者，如《论语辩》上篇，抛弃陈说，认为《论语》是曾子弟子所作，其说甚确。有的辨明书作者的年代，《辩列子》指出列子当为鲁穆公时人，刘向谓郑穆公时人，甚误。有的辨书的真伪及内容的真伪，如断《亢仓子》、《鹞冠子》为伪书，富有卓见。在考辨中，作者运用了多种方法。有的是资料考索，如确定列子的生活年代即据《列子》所载及《史记》年表。有的综合分析，如《辩亢仓子》：“太史公为《庄周列传》，称其为书《畏累》、《亢桑子》，皆空言无事实。今世有《亢桑子》书，其首篇出《庄子》，而益以

庸言。盖周所云者，尚不能有事实，又况取其语而益之者，其为空言尤也。刘向、班固录书无《亢仓子》，而今之为术者，乃始为之传注，以教于世，不亦惑乎！”这是从书的来源和前代著录情况两个方面考察。有的则从思想体系和语言特点上把握。如《辩晏子春秋》认为《晏子春秋》主要反映墨子思想，其作者疑为“墨子之徒”。又《辩文子》，认为《文子》一书，内容驳杂，对其他各家思想皆有剽窃，意绪文辞，多有抵牾，所以此书不尽为文子所作。《辩鶡冠子》则主要从语言特点上断定其为伪书。

柳宗元的这些考辨结论，多可信从，有的观点，后世虽依违不一，但也言之成理。柳宗元的这些考辨工作开宋人疑辨群书之先河。胡应麟在《四部正伪》中评价其功绩说：“若扶邪摘伪，判别妄真，子厚之裁鉴，良不可诬。所论《国语》、列御寇、晏婴，鬼谷，皆洞见肝膈，厥有功斯文，亦不细矣。”

柳宗元去世后，他的作品由刘禹锡辑为《河东先生集》，至北宋已很少流传，至今北宋刊行的柳集都已亡佚，刘禹锡亲手编定的本子实已无从见到，只有南宋及明清刻本传世。1978年，中华书局以南宋百家注本为底本，参考其它诸本的校点本《柳宗元集》，是目前较为完善的柳氏文集。本书选篇从文字、编排次第皆以此本为准。

本书的选注，得到了南开大学余才林、安易两位同志的帮助。余才林撰写了《惩咎赋》、《愚溪对》、《说车赠杨海之》、《与裴晤书》、《与萧翰林俊书》五篇注释，安易撰写了《与李翰林建书》、《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五篇注释，余才林并撰写前言，特此说明。

余才林

# 目 录

|              |      |
|--------------|------|
| 前 言 .....    | (1)  |
| 瓶赋 .....     | (1)  |
| 牛赋 .....     | (3)  |
| 惩咎赋 .....    | (5)  |
| 四维论 .....    | (11) |
| 六逆论 .....    | (13) |
| 桐叶封弟辩 .....  | (17) |
| 辩文子 .....    | (20) |
| 辩鬼谷子 .....   | (22) |
| 辩鹬冠子 .....   | (24) |
| 对贺者 .....    | (26) |
| 愚溪对 .....    | (28) |
| 鹬说 .....     | (34) |
| 捕蛇者说 .....   | (37) |
| 褚说 .....     | (41) |
| 说车赠杨海之 ..... | (45) |
| 谪龙说 .....    | (49) |
| 黑说 .....     | (51) |
| 观八骏图说 .....  | (53) |

## 2 柳河东小品

---

|                    |       |
|--------------------|-------|
| 宋清传 .....          | (55)  |
| 种树郭橐驼传 .....       | (58)  |
| 童区寄传 .....         | (61)  |
| 螾蜃传 .....          | (65)  |
| 骂尸虫文并序 .....       | (67)  |
| 宥蝮蛇文序 .....        | (72)  |
| 憎王孙文序 .....        | (74)  |
| 辩伏神文序 .....        | (76)  |
| 伊尹五就桀赞 .....       | (77)  |
| 戒惧箴 .....          | (80)  |
| 忧箴 .....           | (81)  |
| 师友箴并序 .....        | (83)  |
| 敌戒 .....           | (85)  |
| 三戒并序 .....         | (87)  |
| 谤誉 .....           | (92)  |
| 鞭贾 .....           | (95)  |
| 吏商 .....           | (97)  |
| 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 .....   | (100) |
| 杨评事文集后序 .....      | (103) |
| 送邠宁独孤书记赴辟命记序 ..... | (107) |
| 送宁国范明府诗序 .....     | (111) |
| 送李判官往桂州序 .....     | (114) |
| 送萧鍊登第后南归序 .....    | (116) |
| 送独孤申叔侍亲往河东序 .....  | (119) |
| 送豆卢膺秀才南游序 .....    | (121) |
| 送薛存义之任序 .....      | (123) |
| 送薛判官量移序 .....      | (125) |
| 送李渭赴京师序 .....      | (127) |